

在石家庄和保定中间有个小城定州。定州的文化元素有很多,但定瓷的名气似乎盖过了一切。来到这座古城的每个人,看到的都不一样,而我遇见的是苏东坡。

公元1093年的秋天,大宋边陲重镇定州迎来一位从京城北上的父母官。他就是苏轼。那时,“东坡居士”的雅号已声名远扬,人们更愿意叫他苏东坡。

苏东坡一生三起三落,任职定州,是他人生三次低谷期的重要节点。“今年中山去(定州是中山国故地),白首归无期”,在写给弟弟苏辙的告别诗中,可以看到他的心情之悲愤、之沉重、之孤独。他此番出京,果然再也没能回来。

我到定州,同样是在秋天。此情此景此物,已迥异于苏东坡眼中的定州。舟车劳顿,先安抚辘轳饥肠。找了一家还算不错的饭馆,问有啥特色菜。牛肉罩饼、定州焖子、八大碗……服务员介绍了几样,其实我最关心的,是作为美食家的苏东坡有没有在这里留下愉悦味蕾的好食材。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,服务员还特别强调“整座定州城也没有这样的菜”。倒是有一种酒,叫“中山松醪酒”,是苏东坡发明并定名的。

对上了!没有酒,苏学士还能称作苏东坡?东坡先生,一半是诗文,一半是美酒。这也应了他给酒起的别名——“钓诗钩”。

妙哉。原来东坡先生的千古文章都是被美酒佳酿给“钓”出来的。查询发现,他还专门为此酒写了一篇《中山松醪赋》。看,东坡先生“跨超峰之奔鹿,接挂壁之飞猱,遂从此而入海,涉翻天之云海”,骑奔鹿,接飞猴,驰骋太行,连脚下翻滚的云海都显得那么渺小;听,东坡先生“使夫嵇、阮之伦……漱长风于齿牙,犹足以赋《远游》而续《离骚》”,与饮中八仙慷慨以歌,高唱大江东去,追寻屈子续《离骚》。

奇哉。这篇赋洋洋洒洒三百余字,没有佳酿哪能“钓”得出来?更可贵的是,此赋的墨迹得以传世,现藏吉林博物馆。我没有见过真迹,但在定州博物馆里看到了该帖碑刻。文以载道,字如其人,一贯的婀娜飘逸又不失浑雄苍劲,有古槎怪石之形,有狮蹲虎踞之姿,有大海风涛之气。文、书、碑、酒,四宝聚齐,从中看到了一个喜欢热闹的苏东坡,一个遗世独立的苏东坡,一个决不推屈折腰的苏东坡。

酒和墨,流淌千年,历久弥香。中国白酒从1915年巴拿马博览会上拿回金奖的,不只有茅台,还有中山松



在定州遇见苏东坡

赵威

醪酒。后来,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,点名要喝它,看来田中首相也是苏东坡的“铁粉”啊。

也是在定州博物馆,赶上临展“又见东坡”,得知定州还有一东坡遗物——雪浪石。多方打听,得知此石正在定州城内一医院的雪浪亭里等着我。费了一番周折,经人指点,方与之相见。此处古树众多,看样子很少有人来,静得很,只有脚下的窸窣窣窣和被隔离很远的车马喧嚣。细观此石,黑质白脉,中含水纹,若雪浪翻飞、石间奔流。苏东坡偶得此石,如获至宝,用汉白玉琢芙蓉盆盛放,命名其室为“雪浪斋”,作《雪浪石盆铭》刻于芙蓉盆沿。

意犹未尽的苏东坡,又题《雪浪石》诗一首。从太行山的雄伟险峻开笔,衬托雪浪石的非凡来历,笔锋一转,感叹这样一块当年“惊落天骄魂”的“飞石”,如今却“僵卧枯榆根”,变成了被画师描摹、老翁玩味的观赏石。这哪里是写石,分明是在写自己,以石的遭遇联想到自身的处境。就像《中山松醪赋》中那句“岂千岁之妙质,而死斤斧于鸿毛,效区区之寸明,曾何异于束蒿”,感叹松树千年造就的良好质地,却死在刀砍斧劈之下,轻如鸿毛。被点燃之后,贡献出短暂光明,又何曾有别于一束蒿草。

烈士暮年,壮心不已。从诗中可以看出,在政治绞杀中疲于奔命的苏东坡,至此仍没有放弃他的儒者人生。他的“人世”,是与命运的抗争,也是与生活的和解。林语堂说苏东坡“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,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,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,是散文作家,是新派画家,是伟大书法家,是酿酒实验者,是工程师,是假道学的反对派……”而我想补充一句,他是一个实干家。

漂泊定州的苏东坡,就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,但

里有光,哪里都是他的归乡,都是他施展抱负的舞台。

定州城内有一巍巍宝塔,名开元寺塔。建塔之初,是为了瞭望敌情,苏东坡到定州时,此塔已矗立世间四十余载。作为诗人,此塔不可能不激发他的登高雅兴;作为军政长官,他也不可能不登塔查验武器装备。如今,为保护古迹,每天限制登塔人数,为了追寻苏东坡的足迹,到定州后的第二天我早早起床,排在购票队伍的第一个。

迫不及待登塔,果不其然,塔内数十款碑刻,题记记录诸多曾驻守定州的著名将领和地方官员。其中,塔内三层上塔路道的拱顶左侧保存一处题记,题写于北宋宣和三年(1121):“绝顶西南面塔身有东坡题字,正北门扇上有浮休题字……来者不可不一到绝顶也。”浮休就是苏东坡的好友张舜民,曾和东坡游黄州赤壁,两人有许多相似之处,同在宦海进退沉浮,共游山水赋诗唱和,都做过定州知州。题记中的作者登塔看到两人的墨宝后,情不自禁写下这几行文字。遗憾的是,东坡和浮休的题记已找寻不到,但宣和三年的这些文字清楚地告诉后人,苏东坡曾登临宝塔。

登上宝塔的苏东坡,想了些什么呢?他是一个容易感伤的人。是朝堂上的是是非非?是生命里的云起云落?或许,他看到的是天高云淡。

踏着东坡踏过的石阶,触摸着东坡触摸过的墙壁,辨识着东坡辨识过的碑刻,不觉间已登临七楼,目前能登上的最高处。窗外,定州大地,古韵新风。每上一层,古城画卷就往远处铺展多姿。伴着秋日明媚的阳光,这座千年古城更加妖娆多姿,充满活力的宋韵文化依旧浸润着当代定州人的生活。

题图:定州开元寺塔

插图:苏轼在定州时偶得的“雪浪石”

《医者仁心》：探寻事件背后深藏的真相

潘宇翔

众记忆中难忘的经典,比如《神秘的黄玫瑰》《橡树,十万火急》《沸腾的生活》等。

《医者仁心》2021年在我国上映,是时隔近30年后再次在中国院线上映的罗马尼亚电影。本片改编自真实事件,故事原型是一场发生在罗马尼亚的医疗事故。2015年10月30日,罗马尼亚一家夜店发生火灾,26人死亡,146人受伤。在伤者接受救治的几个月中,高达38人死于细菌感染。这次事故在罗马尼亚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,也激发了加泰林·罗塔鲁和加比·弗吉尼亚·萨尔加创作的灵感。这两位导演是大学同学,毕业后就开始合作创作电影,两人的创作理念都是试图去探究人类个体的命运。在《医者仁心》中,导演通过一个医生的视角展现了小人物面对大环境时挣扎、窘迫的状态。加泰林·罗塔鲁大学毕业于表演系,他在片中出演一名医院管理人员,还和男主角展开了一段精彩的对手戏,秀了一把演技。除了导演的参演,获得2012年戛纳金棕榈最佳女演员奖的罗马尼亚演员克里斯蒂娜·佛罗托也加盟本片。佛罗托最早在剧院当戏剧演员,2012年出演了电影处女作《山之外》,也许正是前几年戏剧表演的积累,使她所扮演的角色令观众记忆深刻,成就了自己电影事业的“开门红”。

让我们一起走进电影《医者仁心》,去探寻深藏在事件背后的真相。

3月30日22:25 CCTV—6电影频道与您相约《医者仁心》,3月31日15:21“佳片有约”周日影评版精彩继续。



本周推介的佳片是罗马尼亚电影《医者仁心》。罗马尼亚地处欧洲东南部,巴尔干半岛北部,是东南欧面积最大的国家。关于罗马尼亚,有三个关键词经常被提及:“罗马后裔”“欧洲之虎”“中国友邦”。

说罗马尼亚为“罗马后裔”,是因为它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号带“罗马”二字的国家。在拉丁语中,“尼亚”有地方、国家、民族的含义,所以罗马尼亚可以理解成“罗马人的国家”。罗马尼亚和古罗马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,当时罗马尼亚的土著民族达契亚人受罗马帝国影响,建立了罗马尼亚历史上第一个朝代,在公元2世纪早期被并入罗马帝国疆域。后来罗马帝国大势已去,各个民族也掀起了独立浪潮,罗马尼亚则带着极具罗马帝国传承意味的国号发展了下去。“欧洲之虎”的美誉则源自罗马尼亚经济的腾飞。罗马尼亚国内生产总值在2014年增长了2.8%,2015年增长了3.5%,成为欧盟范围内经济表现最好的国家,并且在2019年被世界银行列入高收入国家。关键词“中国友邦”,是因为罗马尼亚坚持对中国的友好关系。1949年10月5日,新中国刚刚成立,罗马尼亚就主动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,是最早跟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,数十年来两国关系一直友好,今年10月就将迎来中罗建交75周年。

罗马尼亚电影和中国颇有渊源。作为文化交流,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末期,一批优秀的罗马尼亚电影传入中国,成为几代中国观众二十多年前,我辞掉一家文学刊物的编外编辑工作时,编辑部领导为感谢我的辛勤工作,送我一盒包装精美的《贝多芬交响曲》原声带。文人馈赠礼品,为了免得,大多独尊精神食粮。那时满大街的通俗流行音乐狂歌劲舞,磁带是时尚物品,于是编辑部领导就送给我比较高雅交响曲原声带。

这盒进口原声带共有六盘,收录了贝多芬倾尽毕生心血创作的九大交响曲,也是他留给世人最宝贵的不朽杰作。特别是其中的第三、五、六、九交响曲尤为脍炙人口。我在写作的时候,也常听诸如莫扎特、海顿等音乐家的曲子,用作背景音乐,以助文思泉涌。我收藏的贝多芬交响曲仅有一二首,这下可全齐了。

几十年间,我常温习贝多芬的名曲,沉浸其中,倾听他内心的独白,领略他营造的音乐氛围,神驰于他架构的音乐空间。

人们常推崇贝多芬的《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》(《英雄》)和《c小调第五交响曲》(《命运》)。我尤喜爱后者。这首乐曲是贝多芬耳聋后,又面临个人感情生活的危机,渐生绝望的念头时创作的。换作常人,可能已经消沉郁闷到冰点,但艺术挽救了贝多芬,他最终战胜了命运,顽强地活了下来,写下这首不朽名曲。

《命运》一开始,就以沉重有力的“命运的敲门声”震撼人心,每个音节都是那么斩钉截铁,那么咄咄逼人,使人一开始就进入命运选择的领地。随着乐曲气势磅礴的层层递进,“大弦嘈嘈如急雨,小弦切切如私语,嘈嘈切切错杂弹,大珠小珠落玉盘”,乐曲时而汹涌澎湃、排山倒海,那是象征人们

华说华服

2024年是甲辰龙年。在中国历史发展中,尽管龙灯龙舞生生不息,唯独衣服上的龙纹没有出现在更多人的穿戴上。这一点既不像虎,也不像鹤,虽然虎威猛,鹤带仙气,虎、鹤在孩童的衣帽上都可以普遍装饰,龙却不能。

《史记·孝文本纪》中写道:“盖闻有虞氏之时,画衣冠异章服以为侈,而民不犯。”《尚书·益稷》里有:“予欲观古人之象,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,作会(绘);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,绣,以五彩彰施于五色,作服,劝明。”唐孔颖达疏:“以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六章画于衣也;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六章绣于裳也。天之天数不过十二,故王者制作者皆十二,顾氏取先儒之说……又云:藻取有文……凡十二章,天子以师祭服。”看来,中国古服讲究“服章”的基础十二章,就是帝王正统礼服上必有的12种图案,而这其中便有龙。“衮衣”即是饰有卷龙纹的衣服,在《毛诗传笺》等古籍中均有释义。《诗经·大雅·烝民》里提到周王的衮衣时说:“衮职有阙,维仲山甫补之。”

秦汉及以后,十二章、衮衣、冕冠,一直是服装制度中的重头戏,用在皇帝礼服上有一定的规格,大臣们无论品阶多高,都不能在这一点上僭越。清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,虽然说统治者是真龙,从朝代建立之初就规定满汉一律髡发梳辮,官员及至所有男性必须穿满服,保留游牧民族马蹄袍、一字襟等特色服饰,不惟轻易学汉族。可是,在官服面料的织绣图案上,特别是作为官员品阶的标志——补子,则完全沿袭明朝传统。龙在清王朝服装制度中的地位,依然是最高、最神圣的。

由于清代服装制度异常繁缛,精细,因而对龙纹的规定明显多于前朝,这从《清史稿·舆服志》及其他相关古籍中都能够看出来。如,清雍正元年(1723)重定皇帝礼服时,除标明用石青、明黄、大红、月白色缎外,还规定要有圆金龙九条,龙口珠各一颗。腰襕小团金龙九条,周身五彩云,下八宝平水,万代江山。除色彩外,还特别强调图案。

《大清会典》中对于皇帝的冬朝服有明确规定,上织绣五爪金龙三十八条,其中正龙九条,行龙十一条,团龙十八团。分布为上衣两肩前后正龙各一条,腰帷行龙五条,衽正龙一条,裳褶前后团龙各九团,底襟一团,共十九团。衮正龙两条,行龙四条。披领行龙两条。袖端正龙各一条。除此之外,还有十二章。

清代每更换年号时,都会重新修订服装制度,且往往有一些细微变化。关于皇帝朝服,太多文献记载的是绣九条金龙,但从实物观察像是八条(前三、后三、两肩各一),掀开衣襟才发现里襟有一条,穿上以后看不见,因而也有皇帝自身为一龙的说法。整体为九龙,平时从前、后分别能看到五龙,这正应了“九五之

尊”。另有团龙衮服,所织龙改为四个圆形图案,胸背两肩各一。皇族的团龙补服与此类似,清朝吴振棫《养吉斋丛录》中记载:“皇子、亲王、郡王、亲王世子,用四团龙补服,有赏四团龙正补服者,特恩也。”至光绪年间,赏赐团龙补服逐渐被“六合同春”补服所取代,不过皇帝朝服不误。《晚清宫廷生活见闻》辑傅佳《记清宫的庆典祭祀和敬神》中写道:“元旦庆典,向例在乾清宫举行,上午九时典礼开始,溥仪穿着淡黄色的龙袍,外罩着有日月星辰的团龙补褂,升上宝座。”

最有戏剧性的是太平天国众首领。金田起义时,原本是反清反皇帝,洪秀全曾借上帝和耶稣之口,把龙比作“魔鬼”“妖怪”“东海龙蛇”;而后来朝封王也穿龙袍,怎么自圆其说呢?

他宣布:众王穿龙袍,要将龙的一只眼射瞎。衣上龙纹即可见一只眼的眼珠缩小,显得眼圈很大。太平天国认为,凡射瞎了一只眼的龙即为宝贝金龙。到咸丰三年(1853)以后,此规定渐渐放松,《天父下凡诏》写道:“今后天国天朝所刻之龙尽是宝贝金龙,不用射眼也。”后来,南京“太平天国纪念馆”里还保存了一件射了眼的龙纹太平军将领马褂。

蟒袍与龙袍的区别,也有政治游戏的意味。《大清会典》载:“凡五爪龙缎、立龙缎等,官民均不得服用,如有特赐者,亦应挑去一爪穿用。”这就引出一蟒袍来,硬说“五爪为龙四爪为蟒”。实际上,清代蟒袍实物上照样有绣五爪的,后来京剧服装中蟒戏的爪数也不严格。

还有一点,长期以来人们对龙纹龙饰的印象是,只用于皇帝,而不用皇后,皇后往往是凤衣凤饰。实际上,清代皇太后、皇后、皇贵妃的冬朝服上也织绣五爪金龙纹十七条,其中正龙六条,行龙十一条。分布为两肩前后及两袖袖端正龙各一条,底襟行龙一条,下摆前后及两袖上行龙各两条。披领行龙两条,间饰五色云端等纹饰,下幅为八宝平心、江山万代等纹饰。

说起来也不奇怪,北京定陵万历皇帝墓出土的两个后妃生前所用的凤冠实物,都显出上面有龙形装饰。史籍记载的明后妃凤冠,即有九龙四凤冠,还有双凤翔龙冠、九翟四凤冠及鸾凤冠等。冠上既有立体的凤,也有立体的龙,都在嘴里衔着一串珍珠或珠花,下垂至肩。另有皇后的霞帔上也常见飞凤卷龙的纹饰。

龙耀龙彰显了深厚的文化底蕴。《周易·乾》中即有多处言及龙,如“见龙在田,利见大人”“飞龙在天,乃位乎天德”“时乘六龙以御天”,龙在中国人心中有着特殊的地位。更何况,中国人塑造的龙,本来就不是现实世界的动物。

近代以来,闻一多等大文人屡屡谈及龙的形象,有说是源于闪电,有说是源于鳄鱼,有的则说是用了马的腿、蛇的身、龟的颈、鹤的腿、鹰的爪。无论哪一种说法,龙都不是平凡形象。因而在严格的服装制度中,龙具有至高无上的位置是不足为奇的,文化使然。

题图:天津博物馆正在展出的清代明黄色蟒丝云蝠龙纹吉服袍



邮缘(二)

张岱年：究天人之际

吴裕成



“世界思潮”刊登此文时,张申府附以“编者特记”:“季同此篇,析事论理,精阔绝伦。切望平津读者不可因敌迫城下,心神不宁,遂而忽之。同时更宜信:有作出这等文字的青年的民族并不是容易灭亡的。”

这是抗日救亡时代背景下的学术研究。1934年1月25日,张岱年在《大公报》刊文《中国思想源流》,其中写道:“中国民族现值生死存亡之机,应付此种危难,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。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模仿,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,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,而是一种新的创造。”为了民族的复兴,希望创建新哲学,堪称那一代哲人的文化自觉。1936年,张岱年完成哲学名著《中国哲学大纲》。

1997年年初的那次拜访,听讲过《大公报》之后,我请张先生再续前缘,关注天津的晚报,说时副刊正在做博导征文。他允诺写一篇关于哲学的文章,文章将在2月中旬写出。接着说,“这个年纪,写得慢了,医生讲该把工作放在第二位了。”张先生的文稿如期而至,这便有了《博导晚谈录》征文集里的那篇《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》。